

經 濟 發 展 策 略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bert O. Hirschman 著

徐 育 珠 譯

經 濟 發 展 策 略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lbert O. Hirschman 著

徐 育 珠 譯

序 言

〔直接經驗之闡明乃任何思想的唯一辯證；而思想之掀起在對這種經驗組合的觀察加以解析〕。

懷特海 (Whitehead)*這句話，在我開始計劃寫這本書的時候便給我很大的鼓勵。因為我知道我主要的工作是要嘗試闡述我在一個所謂低度開發國家 (underdeveloped country) 所得到的直接經驗。在此嘗試過程中，我所搜集到的各項觀察及感想，就像一普通主題的多項變調。因此，我便著手去發掘這個主題，以便用此去解說經濟發展的各種問題。

與現時流行學說意見之不合成為我這次努力工作的自然附屬物，有些時候只有當我正在創造自己一套思想時才明白到。但在某些範圍內，我一直都對我們現存的知識非常不滿，例如：在決定發展的基本策略時，諸如那一部門或何項工業應該首先發展，我認為現有的理論似乎對低度開發國家的決策者特別顯得鮮有幫助。本書乃在嘗試發掘一些解決此等問題的新思想方式。

顯然，我自己受到兩種非難——太過一般化以及證據不充份。我對第一項的答覆是任何理論都是建立在有限的觀察；事實上，對某一國家有密切的認識會產生許多有關社會進展最有用的通則。另一方面，我很清楚許多敘述僅是假設而已，必須留待考驗。然而，我須把我的理論先作一個綱要，主要因為我希望能有限的時間來完成我的工作。我更感到在這階段經得起考驗的假設實在太少，就研究經濟發展來說，這比資料短絀更易造成嚴重的瓶頸狀態。假設產生資料，我的確希望我的某些——有關有效次序、連鎖效果、差別生產力等的主張能够經得起實證研究的考驗。

* 進展與實際 (*Process and Reality*)，紐約，麥克米蘭公司，1930年，p. 6.

1956~1957學年度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聘任我為歐文·費雪 (Irving Fisher) 研究講座教授，這給予我最好的機會去咀嚼我在哥倫比亞 (Columbia) 所得到的經驗。此外，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補助我一筆研究基金，使我能够在翌年完成本書的初稿。

一旦從事寫作以後，我就很難有機會多看書，以致1957年中以後出版的書籍以及文章未能完全留意到。

我非常感謝湯瑪士·謝林 (Thomas Schelling)，受他的啓示，我開始思考和草擬初稿；並感謝 RAND 公司的小查理斯·胡爾夫 (Charles wolf, Jr.) 及保羅·克拉克 (Paul G. Clark) 給我整個原稿的批評；詹姆士·陶炳 (James Tobin) 對本書第九章惠賜寶貴意見；萊德·藍諾茲 (Lloyd G. Reynolds) 不斷地從旁幫助我；伽洛蓮·盧根 (Caroline H. Logan) 女士不厭其詳的給我指示和指導我寫作技巧。

這本書其中有部份曾刊登于1957年6月號和9月號的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以及1955年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出版之投資準則與經濟成長 (*Investment Criteria and Economic Growth*) (米里坎 [M. F. Millikan] 編)。我也很感激國際經濟學會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准我借閱他們1957年8月在里約熱內盧 (Rio de Janeiro) 舉行圓桌會議的部份文件。這次圓桌會議所討論的事情給我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別是當我發現那些研究巴西及拉丁美洲經濟問題的學者，諸如羅勃都·甘普斯 (Roberto Campos) 和亞歷山大·卡夫加 (Alexandre Kafka)，他們在研究發展過程方面，其中主要部份與我所得到的結論非常相近。

內子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她使我獲得很多經濟學者未能發掘到的豐富資源。

最後我要感謝哥倫比亞，從 1952 年到 1956 年我一直在這個國家作客，先爲官方的經濟顧問，後爲私人顧問。在此期間內，這個國家一直處於政治分裂的狀態，相對地才使得它的經濟進步顯得特別凸出。幸好它現在正全心致力於政治改革，我由衷地祈望它的成功，並深深感激哥倫比亞人民協助我企圖瞭解有關「環境」(“ambiente”)。

康乃狄格州 (Connecticut)，新哈芬 (New Haven)

1958年 5 月

經濟發展策略 目錄

序 言	(1)
第一章 初步探究	(1)
基本轉變之研討	(1)
後進者之重要性	(5)
觀念的改變為轉變的一種障礙	(8)
以團體為中心的改變意識	(8)
以個人為中心的改變意識	(10)
誇大的預期與個人流動性偏好	(14)
誘導機能之需要	(18)
第二章 成長模型及發展過程	(25)
成長經濟學——助力抑或阻力？	(25)
投資活動的解釋	(28)
投資能力	(30)
投資的補助效果	(33)
發展的阻力	(36)
第三章 平衡成長：一個評論	(43)
需要平衡是否必要？	(43)
內部化學理之矛盾	(46)
內部化的不同型式及其對成長的影響	(48)
第四章 不平衡成長：一個辯護	(55)
供給平衡是否必要？	(55)

發展是一連串不均衡的鎖鏈·····	(57)
誘發投資的定義·····	(60)
某些有關的觀點·····	(63)

第五章 投資選擇與策略 ·····(67)

有效次序與投資準則·····	(67)
社會固定資本與直接生產活動·····	(72)
定義與偏見·····	(72)
社會固定資本因過剩與短絀而引起之發展·····	(75)
不同順序的適應性·····	(78)
經由社會固定資本短絀而發展的限制·····	(84)

第六章 相互依存與工業化 ·····(89)

向後連鎖及向前連鎖的定義·····	(89)
心理實驗·····	(94)
向後連鎖作用·····	(98)
一個基於向後連鎖的資本形成模型·····	(102)
聯合向後及向前連鎖·····	(104)

第七章 工業化：特性之進一步探討·····(109)

進口在導致工業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	(109)
雙重性發展的理由·····	(113)

第八章 個別廠商之效率與成長 ·····(121)

內部激勵之需要·····	(121)
維護問題及其解決之途徑·····	(125)
解答之一般化·····	(129)
資本集約技術？·····	(133)
生產抑或行政工作·····	(135)

第九章	干擾的角色	(141)
	通貨膨脹	(141)
	物價上漲壓力的型態	(141)
	價格—價格螺旋上漲	(144)
	平衡成長與通貨膨脹	(148)
	國際收支平衡的壓力	(149)
	供給不平衡與進口需求	(149)
	外匯的幻覺	(150)
	快速成長產品的「出口能力」為外部平衡 的一個條件	(152)
	外匯波動的成長誘發效果	(155)
	人口壓力	(157)
第十章	區域間與國際間經濟成長的傳播	(167)
	「成長點」與落後地區	(167)
	涓滴效果與極性效果	(170)
	公共投資的區域分配	(172)
	區域間與國際間傳播的比較	(176)
	分離主義的情況	(176)
	犧牲主權的情況	(177)
	最佳機構安排	(179)
第十一章	結論：政府的功能與外援	(183)
	政府的兩個功能	(183)
	外資與外援的功能	(185)
	對遠景的爭論	(188)

第一章 初步探究

基本轉變之研討

對經濟發展問題加以詳細研究後，每會產生一個令人沮喪的結果：這些研究曾經發現經濟發展受很多因素情況、障礙及先決條件之影響。其研討方向業經由對客觀、有形及量化現象的研究發展到對主觀、無形及不可計量現象的研究。在1914年以前，甚或1929年以前的一段漫長歲月裏，在討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時，自然資源始終佔據中心的地位。稍後，人造及可予量化的資本才被視為發展的主體。一個普遍流行的觀念是：低度開發國家祇要能透過她們自己的努力或外援，得到足量的資本，便能「無事不克」，但這種資本在發展策略上重要性的信念却遭到日益增加的挑戰。在經濟發展的近因中，企業與管理人才之供給，至少與資本在官方文件上，係立於同等重要的地位^①，「非傳統性投入」諸如對人力方面的投資，其貢獻以及資本財以外進步技術的引進也曾經受到重視^②。

當論及影響資本、企業精神及技術供應等間接決定經濟發展的諸種條件時，其景象更令人迷惑！這些條件通常包括公共秩序、法律執行、及公共行政最低水準之要求。自從韋伯（Max Weber）以來，許多經濟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們，已經發覺其所認定的各種信念、態度、價值體系、輿論等對企業之產生與發展動機，均有很大的影響，他們也曾經強調少數民族及越軌行為對企業階層形成所扮演角色的重要。配合對基本轉變（*primum mobile*）的研究，心理學家曾經藉實驗方法，去檢定經濟發展與企業活動對成功動機的依賴^③。

從這些理論，雖可獲得許多有價值的見識，但却可能使警覺不夠的讀者，對任何經濟發展之可能性，產生重大的疑慮，蓋因任何停滯的國家，均難以希望其能同時具備那麼多的必要條件。

幸而不同之結論，有許多不同的解釋，當其中一種解釋被提出，前一個解釋便會成為爭論，這通常可演示如下：倘若僅有因素 *B* 能够生產，並使經濟發展起來，繼之被認為很重要的因素 *A*，將會出現而無太多困難。當經驗能顯示出，於適當條件下，任何人、種族或團體都能學習工業技術，以及缺乏自然資源之窮困國家，也能達到高水準的每人產出與所得時，以上的演示過程將告產生。

關於儲蓄與資本方面，人類學家早已發現原始人民在西方眼光中「生存邊緣」的生活水準下，堅持把他們相當可觀的時間、精力、以及資源花在與消費無直接關係之慶典、饋贈等活動。近年來，許多經濟學家們也開始懷疑儲蓄之不足，是否為阻礙發展之最重要因素。除前述現象之外，他們還注意到富者的奢侈消費、窖藏的普遍以及錯誤與非生產性投資的現象到處存在。在另一方面，他們曾經了解儲蓄和生產性的投資是發展的原因，也是發展的結果^④，一旦發展開始，隨處可以坐收意外的利潤；更重要的，當經濟機會被發覺時，消費——儲蓄及工作——休閒方式將會大大地重新調整。資本之供給對利潤預期的改善，其反應是很靈敏的，此尤以低度開發地區農業資本之形成為然；農民對多年生熱帶作物諸如咖啡、可可、橡膠栽培之擴充即為一例^⑤。但包括製造業在內，經過謹慎擬訂並能妥善執行的計劃，其成功很少受資本短絀的影響^⑥。

資本之基本角色往往為那些強調企業精神、技術與管理知識重要的人所藐視。但是足夠的證據顯示低度開發國家通常並不缺乏經營企業的能力，只因為了急功近利及由於知識與經驗之不足，常使其忽視工業發展，而致力於其他更為熟識的貿易及房地產的經營^⑦。吾人曾經指陳企業精神，如同資本，不過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副產品，在一個有利於其存在的社會中，很少發現其是須要的^⑧。分裂後的巴基斯坦、二次大戰期間的中東、以及三十年代的拉丁美洲，其企業精神的驟然產生，足以證明低度開發國家可能隱藏一支企業家的「儲蓄大軍」（“reserve army”），正如同任何清教徒一樣

具有成功的動機。同樣地，有些國家人民基本上的腐化，不遵守法律與秩序是難以辯解的。

企業家管理機械的能力，投資或行動傾向在全球各地都可廣泛發現，只要有適當機會便能證明他們與人類學研究的最近趨勢吻合。因此寇羅克（Kluckhohn）曾謂：「兩代的人類學家正被民族間之差異所困擾，忽略了顯然建立於相同基礎上的『一般文化模式』，和心理的一致性。」^⑨。

當經濟的落後被深深地感覺到不能以人的典型或生產因素之稀少與缺乏來解釋時，注意力因而轉移到有利或有害於所需活動與個性的態度和價值體系方面。在某種程度內，我們將就此點加以探討。但是無論何時，任何視某一既定價值制度為發展先決條件的理論，其提出均將受到事實根據之強烈反駁：實際上沒有具備「先決條件」，發展亦會發生。不同的理論此處再度使彼此抵銷失效。例如，在同一時間內很難爭辯，一般輿論必須利於工業進步，及特殊重要的策略因素是少數團體或個人逾越常規行為的表現；當經濟機會產生時，人們會懷疑是否將被本地企業家或少數特殊人物覺察與利用，此將決定於社會的傳統價值是否有利於改變。

雖然我們為經濟發展受制於衆多的資源與環境感到沮喪，但經濟一旦發展，我們將發現這些資源與環境，並非如此稀少且難以獲得的。這說明了經濟發展受到衆所週知的一系列「相互連結惡性循環」^⑩所限制和阻撓。在經濟發展開始之前，它是難以想像的，這不僅因為有許多不同條件必須同時滿足，而且更受惡性循環的影響：一般說來這些條件的滿足同時又依賴於經濟發展。這就是說，一旦發展開始，即當所有發展的先決條件與環境均已具備時，循環乃可能變成向上的旋轉。

這種探討方法使我們集中注意於經濟發展過程的特性，這是分析與策略的基礎：發展對既有資源與生產因素最適組合的依賴程度少於對隱藏、分散、及不當利用資源和能力發掘的依賴^⑪。經濟學

家們早已感到有關勞動的這種情況，並以「隱藏性失業」(“disguised unemployment”) 加以描述。一旦經濟發展開始，低度發展的經濟能够使資本、企業精神、及其他「先決條件」出乎意料的動員起來，正如同它能够自農業部門設法動員廣大非技術的隱藏性失業勞工一樣。

假使上面的分析是正確的話，一個發展經濟中之週期性失業情況與一個低度開發國家之發展問題必有很大的差異，這兩種情況常被認為各有其特質，而需以不同的方法處理；當一個發展國家處於典型的經濟蕭條期間，失業的勞工與未利用之工廠與機械設備同時存在，必須把不應該分離的部份重新結合。然而，在低度開發的經濟，充其量存有隱藏性的失業，但並無其他未利用的生產因素，因此它的問題係「結構性」的，而非「週期性」的。事實上在一低度開發的經濟中雖然沒有閒置的資本或經過訓練之勞動資源未被利用；但卻不僅在農業部門有未利用之勞工，而且儲蓄的能力也沒有充份利用，並存在著隱藏或誤導的企業人才。先進國家也有大量現成的技術包括現代工業技術可供移植，主要的工作乃在組合這些因素，這一工作固遠較為了克服蕭條必須將閒散生產因素重新組合的工作困難得多，但並非完全不同。

此兩種情況均需要一聯結的力量，所不同者為在低度開發的情況下，需要一種較赤字財政或類似凱因斯學派 (Keynesian) 補救失業政策更為強烈的力量。我們將察覺實現這些策略的方法對發展問題並非完全是空談。

與其認為資源及生產因素完全缺乏，毋寧認為其未被開發，而具有潛力，在這一方向去考慮將有一些益處，因為這樣可使注意力適當地著重於發展過程中，那些不可或缺的動態與策略方面。我們的研究方法不在專門講究資本與企業精神等稀少資源的節用，而在尋找「壓力」與「誘導性機能」，使這些資源能够大量動員起來，把這些資源看作無可救藥的稀少而去計劃分派，可能抑制發展，正

如小孩之生理成長，在一定時間，而不激起其潛在稟賦的話，其發育將會受到很大的阻礙。就此觀點而言，發展計劃主要在於有系統的建立一系列的策略。

這裏對發展問題的形成，特別注意不同經濟資源之使用，對這些資源之積存有著各種不同的影響或「反響」效果（“feedback” effect）。某些自然資源如礦床，並無反響效果：它將被漸漸耗竭。在另一方面，資本則具有大家熟知的反響效果：收入產生儲蓄，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資本通常可得到更多的補足^②，將資本用在某一方面可能導致另一方面的資本形成。而在企業與管理人才之運用方面，反響效果往往是立即的，很難察覺：這些資源愈用愈多（如同練習將可大大改進彈鋼琴或說外文的能力），同時從利用中產生像資本一樣的間接效果。因此，後一種資源於發展初期，可能是最感缺乏的資源，但因其具有直接及強力的反響效果，而且它們的擴充僅受學習能力之限制，也同時可能是增加最快的資源。

後進者之重要性

將發展視為在某些條件下，把具有潛力可加以開發利用的各種資源和能力集合起來的一種過程，似乎將有助於對我們工作的了解。這決不是蓄意的，相反的，這是基於相信發展往往較一般所了解的更為困難。只要想起某種失落的因素，如資本、企業精神或技術知識，人們便可能相信由國外投入該因素或在國內尋找途徑生產之，即可解決該問題。若一個人未慮到集中多種散佈的或隱藏的因素，需要一種「結合力量」（“binding agent”），研究工作將不僅顯得含糊，乃至變成更加複雜，甚至於被認為沒有多大意義，而近乎重覆判斷之行爲。我們何不簡單地說發展有賴於一個國家及其人民爲了發展把本身組織起來的能力與決心呢？

也許這並不如想像中的重覆與含糊。例如，我們若能把注意力集中於決心，便可把握住今日低度開發國家發展過程之特質之一，

亦即後進者的事實。這種情形註定使他們的發展過程要較先進國家缺乏自動自發，而變得更加複雜。

某些發展理論在結構上並沒有把先進與落後國家接觸的基本事實包括在內。他們可能問道：為何某些國家開發了，而另一些國家尚未開發？^⑬此正如同我們詢問為何產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在其他地方呢？一旦經濟進步在先驅國家成了可見的事實，則起而模仿、追隨、迎頭趕上的強烈慾望，乃成為其他後進國家將發生何事的重要因素。

葛陳可郎（Gerschenkron）充份了解到發展過程是各經濟主體深思熟慮迎頭趕上的一種企圖。就他的觀點而言，十九世紀主要的歐洲大陸國家，當它們認真開始工業化時，顯示其工業領袖對發展所作努力的程度及其他特質，因落後的相對程度不同而異。至於發展過程開始之遲緩與其突然的開始，可以被解釋為係考慮到快速經濟發展的利益必足以抵消抑制低度開發國家經濟進步障礙的時間將會到來^⑭。此一理論清楚地顯示後進者之發展通常並非物質之不足或特定「先決條件」之缺乏使然^⑮，此點在前面曾有述及。

我們發現葛陳可郎（Gerschenkron）對發展努力之所以發生的解釋難以了解，根據葛氏的分析，經濟主體在克服社會落後引進各種改革、制度之改變及價值體系之重建等方面所作冗繁的努力，最先看來並不十分值得。但當工業先進者更加前進使相對落後程度增加的時候，經濟進步所得之利益愈來愈大，終必使人努力追求進步。因此，低度開發國家正如歐波羅茂（Oblomov）所描述的，其願意離開他所喜愛的床鋪及房間，只有在天氣特別美妙之時刻。

此處指出經濟主體隨時能夠真正瞭解到為了擺脫落後與達成發展，須作何種努力，因而能夠權衡發展預期的利益和代價，但關於這點却是值得懷疑的。正如同經濟發展沒有一定的「先決條件」，對落後特徵下一個定義乃為不可能之事。某些條件在某一階段對經濟進步是一個阻礙，可是在不同環境下，它却可能是經濟發展的助

力。舉一個例來說，大家庭制度常被認為是發展之阻礙，蓋因其沖淡了個人的誘因^⑥；但它在允許原始社會適應新的技術活動方面，却可能扮演一個建設性的角色：無須事先熟練雇工及會計事務等繁雜問題，能使休閒時間得到盡量利用，並使新的工作得以展開^⑦。

無論如何，低度開發國家只見經濟進步之成果，而很少對他們所要走的道路，能夠有較為深刻的認識，若他們想要獲得進步的成果，他們就須要事先籌劃。如此當他們開始做錯，遇到以及克服相繼的障礙時，才能發現在發展過程中他們社會需要作何種的改變。在此方式下，他們可決定何種制度與特性是落後的，而必須改革或放棄。因此，存在於已知利益與成本間，比存在於目標與對實現目標途徑的無知與誤解間，其所引起發展方面的焦慮較少。

光有決心是不夠的，尚須對必要做的事情有所領悟，而此種領悟只能在發展過程中漸漸習得。舉一個例來說，不少人類事務顯出自目標與手段的聯繫不夠：爲了達到較高的平均個人所得，現在的消費必須減少；爲了利用更多的空閒時間，工作必須作更精確的規劃；爲了達成公平的所得分配，新的不平等必須先行創立等等。毫無疑問的，經濟發展常是追求政治、軍事權力而產生的副產品。爲了發展必須做的選擇與決策，其對權力與聲望之追求較之對增加福利之追求，關係更爲密切^⑧。

將發展成功所必需的許多因素、資源、及能力組合起來的「結合力量」（“binding agent”），其性質目前已經變得更加清晰了。它似乎不僅包括對經濟成長的意願，而且包括對實現這個意願基本性質的領悟。

問題仍然是我們用這種方法去注意事物是否會更有進步？如果「成長透視」是必須的，我們曾經指出此種透視只能在成長過程中漸漸學到。因此我們所已完成的似乎只是使自己背負著其他的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對歐威爾（Orwell）來說，或許所有發展的循環均屬惡性的，只是程度之大小而已。一切的循環均來自發展

與其他因素諸如資本、企業精神、教育、公共行政等，相互依存之結果。但是我們分析所指向的循環可能要求在這些循環系統中取得特權地位，因此它獨自將發展困難歸於人類行動一切困難起源及所屬之處。這方面的困難對我們特別有興趣，以下將詳盡地去探究。

觀念的改變為轉變的一種障礙

希望及追求經濟發展，已到處吸引人們的幻想，成為一種時髦的口號。無可否認的，仍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尚未存有這種幻想。然而，經濟進步不再是少數國家所獨佔，這種覺察已迅速普及而且事實上已滲入到所有國家某些社會團體中。

認為改變與進步是可能而且值得想望的感覺，代表靜態社會一種高度的動態力量，但若這種感覺主要由於外在的示範（outside demonstration）而非自己的經驗，則可能導致對改變過程的各種誤解，因而抑制新目標之達成，直到點滴的學習完成為止。

以團體為中心的改變意識。為了瞭解為何會有這種意識，我們首先觀察大家所熟知的——經常空想的——公社式、合作式的社會。在這種社會裏，個人通常均有其固定的職位與任務，經濟情形改變及改善之可能性難以進入他們的視野，總產量長期固定，個人的改善只能以社會結合及其他份子之犧牲而獲得，特殊的表現因此受到各種社會結構的打擊及懲罰，其中為人所熟知的是巫術的指控。一個孤立的前進並非「調節良好的」（“well-adjusted”）團體成員所渴望，因為該社會控制了具有「人們做其所必須做的，同時在行動中，依其文化之要求尋求滿足。」之特性^①。

當經濟進步之可能性觀念被強加入在這種社會意識中，這一觀念將被解釋為只適用於全體社會。換句話說，個人將認為經濟改變對他們所屬於的團體，每一份子均有同樣的影響，改變的觀念使一個靜態社會的「意識」轉變^②。在靜態社會之下，每一個人對踏入進步或動態社會扮演指定的角色，個人與團體的關係維持不變

。我們將這種改變或進步的「意識」視為是「團體為中心的意識」(“groupfocused”)。

現在所要問的是實際經濟的改變是否與這種「意識」符合；換句話說，以「團體為中心」的進步觀念是否有助於進步的實現？在某些限制之下，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大部份的社區發展方案，及許多技術援助活動，從瘡疾之控制至種子之改良，是完全符合或基於「利益均享的」觀念。此種觀念盛行之處，此類「草根」(“grass roots”)計劃與活動即有成功的機會。

然而，為了不違背可以單獨接受的改變「意識」，仔細的考慮是須要的。無論如何錯誤，相信或懷疑一個計劃可以使個人致富而不能促進集體利益可能易以招致失敗^②，而且在這種方式下，任何發展方案將變得更纖弱，更嚴重的是以團體為中心的改變「意識」與旨在求經濟的基本轉變與現代化之任何大規模發展是不相稱的。這種發展的基本特徵是建立優先次序，某些活動與社區暫時受到優先處理；經由對運輸、能源、灌溉等方面的公共投資創造了經濟機會。這些經濟機會可能被某些個人所攫取，但不為他人所開拓；何況一般說來，當整個社會各階層與團體經由工業化與都市化產生新的局面(created *ex novo*)，社會移動性將很快地增加。

接受這種轉變之困難，已由葛陳可郎(Gerschenkron)針對十九世紀蘇俄知識階級對經濟發展之態度，作了顯明的分析。大多數蘇俄經濟與社會評論家，均希望經濟發展能導致加強土地利用；即使他們以前很少利用工業化和鐵路化。因此，根據葛陳可郎(Gerschenkron)：「蘇俄知識階級之預言家們，不能抓住這種推動國家經濟朝向使人厭煩方向力量之特性……」^②，而且他也指出此種態度經由對大學生的影響如何對發展產生阻礙的效果。

在今日低度開發國家中，對阻礙發展過程之某些典型特徵的全面描述並不常見。但在這些國家中「以團體為中心的」改變意識却強烈發生作用。共產主義之所以對傳統社會具有吸引力量，部份或